

中心建设

许嘉璐副委员长视察汉语史研究中心

2002 年 5 月 24 日上午,一直关注和关心我校汉语史研究的许嘉璐副委员长在参加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之际,特意抽出时间视察了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许先生在视察了汉语史研究中心的办公及教学科研设施后,听取了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王云路教授有关中心各方面工作的汇报,对中心成立两年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勉励中心研究人员进一步把中心办好,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在参观中心资料室时,许副委员长欣然命笔,即兴赋诗一首:

廿载违斯门,今来觅旧痕。师朋或殒没,奥妙孰同论。

茂竹参天节,新松入地根。此行何所获,喜见先贤魂。

许嘉璐副委员长受聘担任本中心兼职教授

5 月 23 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担任我校兼职教授的授聘仪式在西溪校区举行。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为许副委员长颁发了聘书,并为他戴上浙江大学校徽。人文学院院长查良镛先生出席仪式并即席致辞。副校长胡建淼教授主持了授聘仪式。

许嘉璐先生 195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先后担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1986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语言学组组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博士研究生导师。

作为汉语言文字学家,许嘉璐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古代文体常识》等,主编《中国传统语言学辞典》等,曾主持《白话二十四史》等大型工程。

受聘仪式上,许嘉璐先生表示:非常高兴能受聘担任浙大的兼职教授,在自己所有的头衔当中,最为珍惜的就是“教授”这一称号。许先生说,浙大人文学院名师辈

出，是年轻时心仪的学术殿堂，以前曾多次来访，与很多老师建立了非凡的友谊。同时，浙大在高校新布局的改革中先走一步，焕发了勃勃生机，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今日旧地重游，兴奋不已。他表示将继续本着学术要不绝如缕的训诫，根据学校的要求，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聘任仪式结束后，许嘉璐教授应邀为人文学院师生作了关于汉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的学术报告。许先生的报告高屋建瓴，旁征博引，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

丁邦新先生受聘担任我中心客座教授

5月22日上午，聘请著名语言学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先生担任我校客座教授的仪式在汉语史研究中心报告厅举行。授聘仪式由我校社科部部长罗卫东教授主持，我校分管文科工作的副校长胡建淼教授为丁邦新教授颁发聘书、佩戴校徽。丁邦新教授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丁先生表示，很高兴能担任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愿意为促进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尽自己的力量。

《郭在贻文集》出版

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在贻先生的遗著《郭在贻文集》四卷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

郭在贻（1939—1989），山东邹平人，号旻盒居士。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师从姜亮夫、蒋礼鸿等先生。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是当时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著有《训诂丛稿》、《训诂学》、《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等。其中《楚辞解诂》、《唐代白话诗释词》两篇论文获中国社科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二等奖，专著《训诂丛稿》获国家教委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和浙江省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敦煌变文集校议》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三等奖。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郭在贻文集》由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主编，共分四卷，包括《训诂丛稿》、《训诂学》、《敦煌变文集校议》及根据遗稿整理编辑而成的《旻盦文存》上、中、下三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为《郭在贻文集》撰写了序言。

会议信息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 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5月24日，国内外百余名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汇聚浙江大学，纪念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并缅怀著名学者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的学术成就。紧接着纪念会召开的汉语史、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还对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和展望。浙江大学三代求是学人对汉语史和敦煌学的倾情奉献受到专程来杭参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及到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

敦煌学研究和汉语史研究是浙江大学乃至浙江省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海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老一辈学者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姜亮夫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敦煌学家，他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后又拜章太炎为师。历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1953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敦煌学、语言学、楚辞学、古文献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逾一千万字，享誉海内外。

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与敦煌学家。蒋先生1939年之江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之江大学、国立师范学院、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52年起，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在贻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师从姜亮夫、蒋礼鸿等先生。历任

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是当时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姜亮夫的《楚辞通故》、《瀛涯敦煌韵辑》、《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郭在贻的《训诂丛稿》、《训诂学》等，都是汉语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划时代著作，蜚声海内外。

正是在三位先生以及其他前辈学者的开创和努力下，浙江省的敦煌学和汉语史研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尽管三位先生都已先后仙逝，但他们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甘为人梯的高尚风范和他们开创的学术事业正在浙江大学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

人们欣喜地看到，在三位先生的培育和他们治学精神的感召下，浙江大学的敦煌学、汉语史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2001 年初，浙江大学的汉语史研究中心被批准成为教育部直属的百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今年 4 月，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学科又顺利通过了省属“211”重点建设项目的验收。第三代学者如张涌泉、方一新、王云路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继承了师辈们“求是、求真”的治学精神，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并以他们的努力和勤奋，推进了浙江大学的汉语史和敦煌学研究。

在纪念会上，潘云鹤校长致欢迎辞，许嘉璐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毛昭晰、浙江省社联副主席蓝蔚青等发表了讲话。纪念会由校党委副书记郑造恒主持。纪念会的后半段是专家学者的发言，由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主持，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佐藤晴彦教授等讲了话。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

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2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主办的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共有 162 位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学者参加会议，其中包括俄罗斯、日本、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的学者 16 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等几所院校的数十名研究生列席会议并提

交论文。共收到中、外文论文 86 篇，会议论文集将于年内出版。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1.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学术成就的回顾；2. 二十一世纪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的展望；3. 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的其它问题。

会议主要议程安排如下：

5 月 24 日上午，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邵逸夫科技馆二楼演讲厅举行纪念会，分两个时段进行。第一时段（8：20—9：20）由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造桓主持，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致欢迎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毛昭晰教授、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蓝蔚青先生讲话（具体内容另附）。第二时段（10：00—11：50）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主持。廖院长首先宣读了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学会的贺信。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熊国祯编审、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佐藤晴彦教授、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编审、湖南岳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蒋冀骋教授先后发言，追忆三位先生献身学术的可贵品质以及他们的学术成就。

24 日下午至 25 日上午在金溪山庄进行分组讨论，讨论共分 ABC 三组，各四场。

A 组第一场由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编审主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孟列夫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客员讲师荒见泰史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虞万里副研究员、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研究员、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关长龙先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赵逵夫教授、敦煌研究院谢生保研究员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变文起源与发展的札记》、《敦煌的故事纲要本》、《黑城文书〈新编待问〉残叶考释与复原》、《敦煌历日与旧战国秦汉〈日书〉的文化关联》、《敦煌本梦书杂识》、《〈楚辞〉词语考释》、《引我走上敦煌学之路的好书》等。第二场由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王邦维教授主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波波娃先生、武汉大学历史系陈国灿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赵和平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卢向前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刘进宝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金滢坤博士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

《俄藏敦煌行政文书》、《敦煌藏经洞魏晋写经系年订补》、《敦煌文献与西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试论浙江敦煌研究的特色》、《麹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及葡萄酒税》、《晚唐五代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标志——土地对换》、《吐蕃瓜州节度使考论》等。第三场由台湾中正大学郑阿财教授、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研究员主持，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王邦维教授、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编审、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许建平先生、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林世田先生、西北师范大学盛会莲先生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也谈与悉昙入华年代相关的几个问题》、《狄庸教授与佛教语文学研究》、《〈俄藏敦煌文献〉儒家经典类写本的定名与缀合》、《〈降魔变文〉研究》、《〈大云经释〉初步研究》、《唐五代百姓房舍分配及相关问题之试析》等。第四场由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主持，日本国北海道大学石塚晴通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先生、刘景云先生、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江学旺博士、兰州大学历史系陆庆夫教授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关于汉语史研究资料以及敦煌写本和日本训点资料》、《俄罗斯敦煌收藏品的整理出版》、《后汉秦嘉徐淑诗文考》、《普及敦煌文化的开创之作》、《〈史记〉补校》、《姜亮夫与敦煌学》等。

B 组第一场由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岳阳师范学院蒋冀骋教授主持，台湾中正大学竺家宁教授、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佐藤晴彦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方一新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史光辉博士、辽宁大学中文系王魁伟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秀兰博士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慧琳〈一切经音义〉特殊词语研究》、《建立汉语断代史的一个尝试——从〈中国语历史文法〉谈起》、《关于早期佛经翻译年代的语言学考察》、《〈唐律疏议〉词语杂考》、《〈大方便佛报恩经〉翻译时代考》、《伪书文献语料价值述略》等。第二场由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李崇兴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教授主持，台湾嘉义大学朱凤玉教授、河北师范大学苏宝荣教授、日本新潟大学留学生中心藤田益子女士、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阚绪良、丁喜霞、张小艳诸先生先后发言，题目包括《敦煌本〈碎金〉与宋民俗用杂字之比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创新——谈汉语词汇学研究

的发展方向》、《关于〈儿女英雄传〉的钞本——从词汇方面的小考察》、《读蒋礼鸿先生〈三国志词语辑录〉》、《世说新语词语札记》、《“消息”的“音信”义探源》、《敦煌写本书仪语词选释》等。第三场由河北师范大学苏宝荣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张敏先生主持，贵州大学王镞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宋闻兵博士、汕头大学中文系曾昭聪博士、岳阳师范学院蒋冀聘教授、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宫田一郎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东辉博士、河北师范大学赵伯义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胡晓华先生、东北师范大学侯占虎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高列过先生先后发言，题目包括《〈昭通方言疏证〉与近代词语考释》、《中古佛经释词（一）》、《〈长阿含经〉记》、《日本的中日词典之现状与课题》、《〈经籍纂诂〉与汉语辞书编纂》、《论〈尔雅〉对专科名词的解释》、《论〈尔雅〉古注之价值》、《从汉译佛经看四种被动式在东汉时期的特征和发展》等。第四场由贵州大学王镞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朱晓农先生主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王兴水先生、浙江工业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孙力平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池昌海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李崇兴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俞忠鑫教授、张小平先生先后发言，题目包括《说“打点”》、《读〈匡谬正俗〉词语札记》、《试论汉语古典诗句的多义性》、《“藉”表“借给”义辨》、《〈元典章·刑部〉中的动补结构》、《“一之日”解》、《一种特殊的联绵词探源》等。

C 组第一场由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南京大学汪维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蒋绍愚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石毓智先生、温州师范学院马贝加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刘晓红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张敏先生、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唐贤清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吴福祥先生、扬州大学中文系钱宗武教授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受事主语句的发展与使役句到被动句的演变》、《中古时期名词重叠式的发展及其影响》、《〈论语〉的话题后置和隐含》、《蒋礼鸿学术思想刍议》、《反身词和逻名词的融合：论上古和中古汉语里的“自”“己”》、《汉语“渐”类副词演变的规律》、《语言接触与汉语句法的演变》、《〈尚书〉联绵词的类型兼论联绵词的构词理据》等。第二场由四川大学中文系赵振铎教授、宁波大学文学院周志锋教授主持，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吴振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玲璞教授、浙江大学

西溪校区艺术系任平教授、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何丹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汪维辉教授、宁波大学周志锋教授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战国文字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构形方式》、《正本清源说异体》、《汉字字体演变止于楷书的原因》、《青铜器断代与〈周南·卷耳〉篇》、《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管窥》、《说简化符号“リ”》等。第三场由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丁邦新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鲁国尧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黄耀堃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唐作藩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姚永铭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朱晓农先生、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黄笑山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潘悟云教授、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丁治民博士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敦煌残卷“楚辞音”新考》、《重读〈中国声韵学〉》、《姚刊三韵本不尽可依——读〈类篇考索〉札记》、《官话中颞近音的日化现象》、《文学韵和韵书韵的区别》、《〈时要字样〉与“浊上变去”》等。第四场由上海师范大学潘悟云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石毓智先生主持，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汪少华教授、叶斌博士、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叶贵良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惠英教授、湖北大学人文学院任继昉教授、浙江省省委党校祝鸿杰教授、日本熊本学园大学丁锋先生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鞞輶”考——〈考工记〉名物考证之一》、《论“浑言”“析言”》、《“彘”字考辨》、《从“祖、妣”说起》、《断洪绝航 重开津逮——评新编诸子集成本〈商君书锥指〉》、《扶植后学 金针度人——追忆蒋礼鸿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窥基〈法华音训〉原型考》等。

25 日下午举行大会发言及闭幕式。大会发言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主任竺家宁教授主持，四川大学中文系赵振铎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丁邦新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鲁国尧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祝鸿熹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张洪年教授、台湾中正大学国文系郑阿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郝春文教授先后作大会报告，题目包括《〈集韵〉的内部结构》、《关于词汇研究的几点想法》、《诗经正音》、《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先生对辞书事业的贡献》、《变文中韵文的平仄用例》、《敦煌疑伪经与灵验记关系之考察》、《〈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项目介绍》。闭幕式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

所所长、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主持，河北师范大学苏宝荣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石毓智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府宪展先生分别介绍了三个小组分组讨论的情况，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作了大会总结。

参加此次会议的许嘉璐、丁邦新、宫田一郎、赵振铎、鲁国尧、蒋绍愚等许多先生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如丁邦新教授系台湾“中研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代表作有《魏晋音研究》；宫田一郎教授，历任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京都外国语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汉语方言大词典》（日方主编）；赵振铎教授，系四川大学教授，曾任中国训诂学会会长、《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鲁国尧教授，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音韵学会会长，代表作有《鲁国尧自选集》，即将出版《鲁国尧文集》；蒋绍愚教授，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代表作有《古汉语词汇纲要》、《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本次会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内容广泛，涵盖面广。

本次会议的主题主要是纪念三位先生以及敦煌学、汉语史研究方面的有关问题。会议论文围绕这些主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仅就敦煌学而论，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就涉及敦煌文书与文学、史地、佛教、语言文字的研究，敦煌文书整理和修复的探讨及相关出版信息、项目介绍等几个方面。

二、宏观、微观研究并重

本次会议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微观研究的广泛深入，专书、专文、专题的深入研究成了本次会议的“重头戏”。同时也有不少宏观、综合的研究，如苏宝荣教授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创新》，对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方向作了研究，吴金华教授《读蒋礼鸿先生〈三国志词语辑录〉》集前贤今人成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三、突出历史观念

语言材料的年代问题越来越引起语言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佛经的翻译年代尤其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一新《关于早期佛经翻译年代的语言学考察》、史光辉《〈大方便佛报恩经〉翻译时代考》都从语言学（主要从词汇、语法）的角度对翻译佛经的年代

进行了考察。王魁伟先生的《伪书文献语料价值述略》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那些时代明确的伪书应该成为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

语言演变历史的精确研究也是历史观念的一个表现，朱晓农先生《官话中颞近音的日化现象》通过对文献、方言的考察，精确地确定了该音变的确切的起始年代，比起以往仅仅确定大致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四、强调新材料、新方法。

本次会议不少学者都利用最新的材料进行研究。汪维辉《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管窥》对 2001 年 11 月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的《孔子诗论》提出了自己的考释意见；黄征《〈降魔变文〉研究》是在完成《敦煌变文校注》之后，又陆续获得了原卷的真迹、变文题榜等多种重要资料，因而对该篇变文进行了新的补充研究。有的则提供了有关的信息，如石塚晴通先生的《关于汉语史研究资料以及敦煌写本和日本训点资料》指出，在日本，9-12 世纪的训点资料已经超过 4000 件，其中包括比较好的汉语史资料，期待着研究者们参考。

强调新方法也是本次会议论文的一个特点。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张敏先生的《反身词和逻各词的融合：论上古和中古汉语里的“自”“己”》用乔姆斯基的理论对汉语中的“自”和“己”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作了考察；吴福祥先生的《语言接触与汉语句法的演变》考察了异族语言影响汉语句法演变的三种方式。

五、老中青三代齐头并进。

本次会议既有老一辈专家的宏文妙论，如蒋绍愚先生的《受事主语句的发展与使役句到被动句的演变》，研究的问题很具体，但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有方法论意义；也有中年学者颇见功力的专题研究，如虞万里《黑城文书〈新编待问〉残叶考释与复原》根据宋元以来公私书目及与原书校核，确定所谓《新编待问》应为元袁俊翁所撰《新编待问集四书疑节》十二卷中之残叶；青年学人也不甘落后，撰写了内容扎实、很有新意的论文，如丁治民的《〈时耍字样〉与“浊上变去”》认为《时耍字样》是一种按韵编排的分别同音异义字的字书，它用韵书的形式记载了“浊上变去”在唐代某一地区发生乃至完成的现象，文章颇得前辈学者的好评。

从本次会议可以看出本学科最新的发展趋势及研究动向。一是古今汉语的打通。一批原来从事现代汉语研究的学者开始进入到古代汉语研究的领域，他们以深厚的理论素养、独特的研究视角，给汉语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汉语的共时的、静态的描写，而试图通过历时的、动态的研究解释某些语言现象，探讨某些语言现象的演变规律。大家深深感到，不同学科的交叉、碰撞，确实可以使汉语史研究别开生面、另辟蹊径。二是注重描写，力求解释。描写是语言研究的基础，理所当然也是语言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的与会专家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现象的描写。但是语言研究不能把描写当作终极目的，我们对语言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语言研究者对语言演变的内部原因、外部原因的探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具体的、精致的描写，而试图在描写的基础上“推导”出理论。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三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研究汉语。当代的汉语史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文献语言的时代排比，而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世的典籍，学者们利用汉语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来探讨汉语史的问题，甚至那些与汉语没有亲属关系但在历史上与汉语有过亲密接触的语言也纳入了研究者考察的范围。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是以中古-近代汉语研究、敦煌文献研究为其特色。我校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先生在汉语史、敦煌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享誉海内外。姜先生的《瀛涯敦煌韵辑》是汉语语音史研究方面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在考释敦煌变文语词的同时，把许多语词的产生年代上推到了汉魏六朝，为将传统的训诂学纳入到汉语历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郭先生率先认识到汉魏六朝汉语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撰写了《六朝俗语词杂释》、《〈世说新语〉词语考释》等重要论文，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导夫先路。近十多年来，我校的汉语史研究队伍较以往更加壮大，研究也更为深入。一批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成果丰硕，汉语史研究队伍后继有人。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让我们在看到我校汉语史、敦煌学研究在学术界所具有的较高地位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的同时，也看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手段还

不够现代化，有部分学者还不善于利用电脑作语料检索、分析和统计，使研究水平上一个台阶，尚未利用国际互联网来加强和学术界的交流。二是研究的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创新，有些学者的研究方法还比较陈旧，不太重视理论。总之，通过本次会议，我们找到了差距，增强了信心，决心通过中心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积极扩大和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注意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发扬优势，取长补短，争取通过三五年的建设，把汉语史研究中心办成国内领先、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许嘉璐副委员长

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有机会和浙江大学的师生、海内外的学者一起缅怀姜亮夫先生、蒋礼鸿先生和郭在贻先生，是我的荣幸。我不出自姜门、蒋门，但曾执礼和问学于两位前辈。在贻先生生前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所以知道有这样一个纪念会，我能得到邀请，这是我不能推辞的。昨天上午我到姜先生和在贻先生墓前，一执弟子之礼，二致挚友之哀。在我心里，稍稍得到安慰，我在他们的墓前想，哲人往矣，还有待于未来。今天在座有这么年轻的学子参与这样一个盛会，我感到欣慰。浙江大学，薪火盛传，何惧来日之不如昔也。特别是我亲眼看到姜先生、蒋先生和郭先生亲自培养的青年，今天已经都成长为我们国内敦煌学、语言文字学的名家。这是三位先生心血之所注，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环境之所育。所以尽管这两天一有空思想都围绕着三位先生的思想、著作及为人，但是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喜就涌上心头，所以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这次会又和汉语史和敦煌学的会议衔接在一起，我也可以说是恭逢盛会。只可惜我不能像在座的专家和其他师生一样来听这次盛会，接受教益，我中午就要匆匆返京。但我和大家一样，一定要把三位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体现在我自己的求学、研究与做事中。三位先生学问渊博，其造诣海内外共知。为什么他们如此相近，因为他们一生都是博学之人、审问之人、慎思之人、笃行之人。我希望能用这四句话与年轻学子共勉。

这次盛会海内外专家相聚一堂，欢迎他们来到我们浙大。为何说是我们浙大？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经常出入浙大之门，昨天我又有幸被聘为浙大的兼职教授，所以我的讲话有一半是以浙大人的口吻来说。

语言文字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显学，特别是有清一代。今天则成为冷学。但是它又是我们的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我曾经设想，我们的语言文字学如何热起来，应该怎样热。我得出的结论不知对不对？现在过冷是不正常的，需要热起来。但是又不可过热。如果在中华大地上，语言文字学成为最显之学，我们就没有衣服穿，没有车子坐，我们的社会可能要停滞，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科技对于经济建设的贡献的比例越来越大，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所以应该热又不能像乾嘉时期那么热。所以我们的学人在心态上有一个平衡问题。其次，如何让它热起来。我得出两条结论。一、我们要向社会呼吁，向政府呼吁要重视。就像浙江大学对于人文学科中的语言文字学这样重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向社会奉献出我们博学、审问、慎思最后经得起推敲的扎扎实实的成果。用自己的成果争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语言文字学科是一个范围广、门类多的学科，又不可一概而论。像浙大汉语史中心所从事的是基础学科，但是还有很多分支是贴近现实的。而现实生活需要语言学给他们提供知识和智慧。比如说，计算机科学当中对中文信息的自动化处理，从目前看，我们语言学界还没有给计算机界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关于语言的知识。所以我曾经说：应用语言学的一些分支中如果能尽快解决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中的瓶颈，那么就可以大大加快计算机在我国的普及和整个社会信息化的水平。一旦起到了这个作用，它就可以以一个局部向社会昭示语言学的价值，就可以促进整个学科的由冷变热。因此我非常欣赏我们浙大的学人在当前的形势下多年来甘于坐冷板凳，甘于寂寞的这种学者的精神。说到这里，我还想讲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要把基础学科和应用研究就割裂开。没有基础，应用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应用研究，只有基础研究，我们只能在象牙塔里，在我们的沙龙里互相欣赏。事实上，我已感觉到最最基础的一些东西和现代化之间有潜在的密切的联系。比如训诂学，古人对于字义的观察，常常是求其同而不究其异，有时又辨其异而舍其同。如《说文》中的同训和互训，就是求其同，《尔雅》

释诂、释言两篇，是求其同，拿今天的科学看，过于粗疏。但是在面对计算机的时候，古人对于字义的观察给人以启示。这就是计算机在处理信息的时候是分层次分类的，它对于信息是从后向前搜索的。现在西方的计算语言学移植到中国来，是给每个词标注词义的，做电子词典。比如人这个词，假定有两个义项，那么就给它两个标记。字和字之间没有关系。但最好是第一个层次接触一个大类，接着搜索它的小类，小类下再分小小类，最后落实到词或者语素。这种情况下代码少，最后可以细到一个词的词义以及词与词的关系。现在计算机界提出概念层次网络的理论（hnc 理论），这就是从训诂学中得到的启发，非常类似于《尔雅》。《尔雅》首先分十九篇，前三篇关于普通语词，后面是百科。训诂学之所以能绵延两三千年，自有其道理。古人对语言的观察有着他特定的视角。训诂学家所解释的，是当代人不容易了解的。同时古人又熟悉当代的语言环境，表达的习惯。所以他的训释有他的独到之处，可能更接近语言的本貌。计算机则不懂语言，需要懂语言的人来操作。可见基础研究至关重要，应用研究所趟出的新路常常来源于基础研究的一个闪光。应用研究需要从基础研究中获取资料和智慧。同时，搞基础研究的人如果了解一点应用研究的现状和所存在的问题，也可以从基础研究中发现一些可以提供给应用研究使用的知识和智慧。就整个语言学界来说，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要鼓励大力地进行应用研究，只有二者结合，我们这支不算十分庞大的队伍才充满活力，在路边观察我们这支队伍行进的人才能理解我们，给我们呐喊助威。

祝各位与会的代表在我们浙大生活得愉快，祝会议圆满成功。

潘云鹤校长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 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许副委员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纪念会，纪念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并缅怀著名学者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的学术成就。在此，我谨代表浙江大学，向出席这次会议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姜亮夫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敦煌学家，他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后又拜章太炎为师。历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1953 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敦煌学、语言学、楚辞学、古文献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逾一千万字，享誉海内外。

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与敦煌学家。蒋先生 1939 年之江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之江大学、国立师范学院、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52 年起，任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等著作十余种。其中《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版再版，先后重版五次，影响深远，被誉为研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指路明灯。

郭在贻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师从姜亮夫、蒋礼鸿等先生。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是当时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著有《训诂丛稿》、《训诂学》等著作近十种。其中《楚辞解诂》、《唐代白话诗释词》两篇论文获中国社科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1988 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值此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深深缅怀为语言学、敦煌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正是在三位先生以及其他前辈学者的开创和努力下，汉语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成为我校乃至整个浙江省的传统优势学科，我校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敦煌学和汉语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尽管三位先生都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甘为人梯的高尚风范永远都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开创的学术事业正在得到延续。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三位先生的培育和他们治学精神的感召下，浙江大学的敦煌学、汉语史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2001 年初，我校的汉语史研究中心被批准成为教育部直属的百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今年 4 月，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学科又顺利通过了省属“211”重点建设项目的验收。一批中青年学者继承了师辈们“求是、

求真”的治学精神，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并以他们的努力和勤奋，推进了浙江大学的汉语史和敦煌学研究。我们希望再通过若干年的建设，使我校的汉语史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成为整体研究水平居于国内外前列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资料信息中心。我们衷心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继续关心、支持浙江大学的汉语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使老一辈开创的学术事业不断得到发扬和光大。

最后，向多年来为汉语史、敦煌学研究，为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付出心血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遂！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发言摘要

一、毛昭晰教授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和三位先生都比较熟悉，都有交往。他们的学问、道德与为人都是我十分钦佩的。特别是姜先生对我这个晚辈一直十分关心。一个人能像姜先生这样，太不容易。我读王安石文集，其中说：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我一直是个学得很杂的人，但都学得不专。郭在贻先生在五十岁生日差一天就去世了，但他专精一面，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他是成于专，我是毁于杂。但是姜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许多方面都很有研究，在他所涉猎的许多领域他都是第一流的专家。我对姜先生的敬佩无以言表。

他们做学问非常认真，对待人非常诚恳。姜先生的书中对我很有启发，我搞人类学，牵涉到史前的很多问题，有些就可以在姜先生的书中找到答案，特别是他的《楚辞通故》一书。姜先生的眼睛很差，看书时好像不是在看，而是在闻，但仍一丝不苟地做学问，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提倡。今天我们怀念三位先生，不仅是学习他们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学风，我们浙大的“求是”学风。一个人宁肯不发表文章，也不能去作假。做学问就像沙里淘金，可能淘不到，可能只有一点点，但也是你自己的成果。老师固然要解惑，更要传道。我们今天仍要提倡这种学风。求是学风，要代代相传。

二、柴剑虹编审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值此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隆重召开之际, 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代表季羨林会长, 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92 岁高龄的季老由于身体的原因, 不能亲赴盛会, 他也希望与会的北京的几位代表能代他转达对东道主、三位教授家属及其他代表的问候。5 月 18 号下午, 季老在寓所对我说: “这次杭州的会议意义重大。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位先生对学界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们本人有许多杰出的成果, 更在于他们以极大的努力培养了一批学术接班人, 以自己的心血浇灌了一个特色鲜明的教学与科研的园地, 而且这个语言学的园地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季老也再次要我转达他对原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的敬意, 他说: “如果没有沈校长对敦煌学学科的重视和对青年学者的关心、培养, 这个园地的繁荣也是很难想象的。”季老还希望这次会议在优良学风的传承上能为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做出榜样。

根据季老的教诲, 结合我个人学习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位教授治学精神的体会, 我认为当前应该特别注重学者基本素养的培育, 注重学术文化的普及, 注重科研团队精神的发扬光大。要提高学者基本的学术素养, 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着手: 一、端正学术品格。品行不端, 就会走到歪门邪道上去, 必然学风不正。二、加强学术基本功。三位教授都非常重视基本功的锻炼与培养, 其中既包括强调多读书、苦读书。读以致用, 习而求精。我记得姜先生曾多次讲到读书习作都要持之以恒, 切忌心浮气躁, 急功近利。郭在贻先生则常常是连排队买早餐的时间都在看书的。三、讲求学术规范。做学问不是为了关在象牙塔里自我欣赏, 因此必须符合公认的规矩, 追随典范。四、追求学术创新。学术必须不断创新, 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 当然这种创新是建立在前面所说的学术品格、学术基本功和学术规范的基础之上的。五、开展学术批评。正常的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向前发展的推动力, 这里尤其强调学者要谦虚谨慎地听取别人的意见, 勇于补正自己的成果。关于学术文化的普及与科研的团队精神, 由于三位先生的身体力行, 浙江大学的同行们有更多的经验和体会, 一定会在这次会

议中向大家传授。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六卷本的《蒋礼鸿集》已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去年出版，四卷本的《郭在贻文集》刚由中华书局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紧张地赶制二十四卷本的《姜亮夫全集》，可望于年内正式发行。这是三位先生的弟子们对师恩的最好报答，也是上述团队精神的生动体现。

最后，祝会议圆满成功，祝各位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三、 蒋绍愚教授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浙江大学举行纪念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位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这三位先生是三代人，他们各有自己的杰出的学术研究成果贡献给世人，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又是一脉相承的。薪火相传，在他们的培育和影响下，浙江大学在汉语史和敦煌学研究方面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出现了一批新一代的杰出学者，在学术界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突出地位。

姜亮夫先生是和王力先生同一时代的著名学者，是二十世纪早期为我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而开创新局面的先驱者之一。他学识渊博，在音韵学、文字学、敦煌学、楚辞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我在刚进大学时就读过他的《屈原赋校注》，后来又读了他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这是我了解敦煌学的开始。他的《瀛涯敦煌韵辑》在北大图书馆没有，我是 80 年代初在国外读到的，当时很钦佩这位学术界的先辈为学术研究所作的艰苦工作。

蒋礼鸿先生也是一位很渊博的学者，《蒋礼鸿文集》六卷反映了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古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划时代的著作。清儒的词语考释偏重于先秦。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些俗语词考释的著作，但水平不高。直到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出来后局面才有改观。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比《诗词曲语辞汇释》更胜一筹，有了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因此，对词语的考证和诠释更科学、更准确，也注意到词义的发展和演变。蒋礼鸿先生生前对《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作了五次增订，每次都增加了大量新材料。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我们后学的楷模。

郭在贻先生英年早逝，而他发表论文是在“文革”之后，他的学术活动的时候前后只有十年多一点，但他为学术作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的。他主张训诂学的范围要扩大，要延伸到汉魏以下，并且身体力行，对汉魏以下的俗语词进行考释，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同时，根据自己的实践，在训诂方法方面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这都是他对汉语词汇研究的卓越贡献。他还有更宏伟的研究计划，在他的生命之光即将熄灭的时候，他还不要忘记嘱咐他的弟子，一定要完成计划。这种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是多么崇高！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三位先生，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三位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浙江大学已经得到了继承。他们的高足已经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更重要的是，这三位先生的严谨求学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已经在浙江大学的学术研究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而且，正在不断地发扬广大。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浙江大学的学术研究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将会成为屹立在东海之滨的学术重镇，为中国和世界的学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丁邦新教授的发言

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服务，我们那里有个很小的小组，中国语言学，就是我、张洪年、张敏和朱晓农先生。在香港或国外有四个人研究差不多的课题这是不小的阵容。我们与社科院语言所、北大中文系有密切来往，这两个是我们合作最多的地方。廖可斌院长到我们那里去，以前我们也来过，那么经过我们的联系以及跟这里的方一新先生的联系，也是研究汉语史的这一群人，跟这边的汉语史研究中心有一个很密切的合作。我们互补，虽然我们人少。我们一天前就在这里作了个讲演，我们四个人都来了，可以说是倾巢而出。浙江大学有深厚的传统，我想要纪念三位先生，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发扬光大，能够推陈出新。我们四个人这次来，是一个代表团，我想大概在这里还不见得有代表团，我们都来了，正式要跟这边合作，希望能够推陈出新，希望能够发扬光大。所以以后也许我们请这里的人到香港去，到其他地方把这里的学问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愿意把外面所研究的或者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点事情向各位作一个说明，让彼此能够增进了解，让年轻的学生有更多可走的路。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在这个情景下来一个代表团，正式表示对三位先生的敬意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的学问求真求是

精神以及他们厚以待人的一种儒雅精神表示敬意。所以我们很愿意跟他们合作。谢谢。

五、蒋冀骋教授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会议的主持人要我以学生的身份来讲讲话，按常理应该是在浙江大学工作的师兄、师弟来讲。因为他们得几位先生的真传，扛起了几位先生的大旗，他们讲更合适，所以我不敢代表。后来想我也可以代表。因为我既是蒋礼鸿先生的学生，也是郭在贻先生的学生，是郭先生把我招进来读书的，是在蒋先生手下毕业的，受两位老师的教导。当然，受两位老师的教导并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师兄弟。受两位老师的教导又不在杭州的大概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还是我来代表。

这三位先生的治学特点首先是一脉相承的，第二是各有特点。我感觉姜先生的特点是博而专，他在楚辞学、音韵学、方言学、民族学、文字学、史学等领域都有自己的建树。蒋先生的特点是精而新，在敦煌语言文字学、训诂学方面、语言方面、古籍整理方面、字典编纂方面都有很精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敦煌字义，当时有很新的研究的人很少，他是第一家，研究这个领域。郭在贻先生的特点是新而精，他在训诂学、敦煌学、俗字学、说文学、楚辞学、俗语言学方面都很有成就。他的俗语言学方面是国内 80 年代第一人。张相先生研究过，清代人研究过。他研究俗语词的来源，来考释词义。把俗语词作为一个方向提出来，在学界中首先是郭先生。我说他新而精。

蒋先生那里我只去拜见过一两次，第一次是郭先生带我去：你来读书，先拜见师祖吧。那天吃过晚饭，到蒋先生家去，他讲了说文学、历史，还讲了哲学。第二次见面是他一个博士生答辩。在会上听他说话，见了第二次，连门径都没有窥过。

蒋先生和郭先生那里只窥过门径，但没有登堂入室。不是他们的好学生，他们的大旗没有扛起来。浙大的师兄师弟扛起来了。这样讲不一定准确。但他们的治学方面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开这个会纪念他们就是学习他们治学精神。作为学生，我认为在这四个方面向老先生学习：第一个方面，乐于奉献的精神。有一次我到郭先生家里去，他还在写字，他给我写了一幅字，用别人的话赠给我，他写道：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同时还写了一幅屈原《离骚》的两句话：乘骐骥以驰骋兮，

来吾导夫先路！要我们甘于寂寞，乐于奉献。把一辈子都奉献给学术，奉献给这个冷落不受重视的专业，不要心浮气躁。二、讲究发明，追求创新、追求创造。郭在贻先生跟我们说：研究俗语词就是解密码。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几乎每一条都是有发明，有创造的。尽管蒋先生没有看到原卷，但字义解释都是对的。有人提意见，“乘车”的“乘”字蒋先生解释为是“我”的意思。敦煌卷子里“乘”就是“我”，过录的人搞错了。但字义解释还是对的。三、治学严谨，作风朴实。蒋先生不太说话。我 89 年去蒋先生那里问学，他基本上不说话，郭先生给他写了个条子：有所不言，无所不知。他确实不太说话，但治学很严谨，一条就是一条，一个字就是一个字，没有多余的，作风非常朴实。郭先生也这样，他的《训诂学》《训诂丛稿》、《敦煌变文集校议》都是这样的。四、奖励后学，与人为善。这三位老师都有这样的精神。80 年代中期以后，郭先生作为年轻学者名气较大。许多年轻的学生拿文章请他斧正。他经常认真看，提意见，修改，修改好了推荐发表。而且有信必复，一年的信有几百封，都跟年轻的学者打交道。我跟他说：你这么忙，你搞不来的，费力不讨好，各人有各人的老师，搞不好人家老师有意见。他说：“那我怎么办？人家拿来我总得看。”他奖励后学，与人为善，尤其在真理面前，接受批评。我再讲了一个轶事。86 年冬天我来考郭先生硕士研究生。他出了个题目，评价五部训诂学著作。我评价了他的一部，每部我写了优点不足。他那部里我是否该写不足是个考验。我讲了他的优点，和郭先生这部书的不足。考完试后，他跟我说给了我满分，20 分。你如果只讲好的话，这个题目顶多 15 分。这是在考场中敢于跟老师的书讲不同意见，也就是我这个蠢人这么做。但是胸怀这么大，还给满分，这样的老师当然还有其他老师，郭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再讲蒋先生。在我博士论文中有一条跟蒋先生不一样，关于“朝廷”的解释，蒋先生认为是词义的扩大，同朝为官，后来引申为朋友。我认为这个“朝廷”不是“同朝为官”，是契丹语。他很乐意接受了。没有讲不同意见。这种奖励后学接受不同意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作为蒋先生和郭先生的学生很对不起他们。没有为他们的文集出版作任何事情，同时他们的学术也没有发扬光大，只有赖于浙江大学的诸位师兄师弟。

最后我代表蒋先生和郭先生的学生谢谢各位光临这次盛会。谢谢各位！

六、唐作藩教授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我们大家聚会在这里, 隆重纪念三位中国著名语言学家, 姜亮夫先生、蒋礼鸿先生和郭在贻先生, 这是很有意义的。三位先生我都没有机会当面讨教, 他们的著作我拜读了一些, 他们的学术成就突出、造诣很深、贡献很大。他们的文章道德都是令人佩服的。三位先生的学术研究虽然各有专长, 各有特点, 但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做学问严谨求实, 学风踏实, 他们非常重视从古代文献角度研究汉语史, 充分占有材料。他们对文字的考释和字义的阐释以及字音的辨析, 都是通过大量材料分析归纳出来的, 绝无凭空臆断, 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严谨的朴学精神积蓄, 注重从文献上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

我和三位先生无缘见面, 但他们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三位先生中姜亮夫先生是最老的, 我也较早知道他的大名, 因为他和王力先生是清华研究院的同学。我较早从王力先生和王师母那里听到一些姜亮夫先生的典故。我今天不妨介绍一下, 也许有人听过。姜先生比王先生小两岁, 但他考入清华研究院比王先生早一年。他是 1925 年, 王先生是 1926 年。当时的清华研究院学制是不固定的。有的读一年就毕业, 只要论文写出来, 有的读了两三年。王先生和姜先生先后从学的王静安等先生都是大家。研究院的学生不多, 所以他们同学之间, 师生之间关系都比较密切。在他们的四位导师里, 王静安先生去世比较早, 1927 年 6 月投昆明湖去世。后来他的学生们都继承了四位大师的事业, 发展他们的学问。每月王静安先生的祭日, 他们都到颐和园昆明湖祭奠恩师, 他们毕业后, 或留学回国后(王力留学比姜先生要早一点, 王力先生 32 年回国, 姜先生还在法国), 他们还每年去昆明湖祭奠, 一直到七七事变后。30 年代, 王力先生在清华任教, 在北京或从外地来的学生祭奠后, 中午往往到王先生家吃饭, 然后才分手, 后来到昆明, 王力先生和姜亮夫先生的交往还是很密切的, 不仅因为他们是老同学, 而且还因为王师母夏蔚霞先生和姜师母陶秋英先生都是苏州的名门闺秀。姜师母比王师母大几岁。王师母今年 89 岁, 现还健在。王师母和王先生结婚比姜师母和姜先生要早。王先生结婚是 1935 年, 姜先生是 40 年代在昆明时才结婚的。据王师母讲,

姜先生和姜师母恋爱了七年才结婚。在昆明期间，王先生和王师母有 3 个孩子，姜先生和姜师母只生了一个宝贝女儿。姜师母对王师母说：你三个孩子都带得很好，都没有生病，而我只有一个，却忙得团团转。1946 年，王先生与王师母离开昆明去广州，把自己家的保姆介绍给姜师母了。从此一别，他们只有通信联系。尤其解放后，一南一北，只有通信。50 年代，王先生从广州到北京，还介绍一位先生钱宗欣先生，中山大学的一位老师，也是我的一位老师，由于他在北京生活不习惯，王先生给就姜先生写信介绍到杭州。先是在杭州大学就是当时的浙江师范，后又转到浙江工业大学，因为他夫人在浙江工业大学工作。

今天向各位介绍往事，是为了缅怀纪念我们敬爱的前辈学者，我们敬爱的姜亮夫先生。我的话完了。谢谢！

七、熊国桢编审的发言

我谨代表中华书局热烈祝贺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并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浙江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学养深厚、贡献突出的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其人文学院名师辈出，硕果累累，硕彦新秀，后先相继。姜亮夫、蒋礼鸿先生开创在前，郭在贻先生承前启后，而现在年富力强肩负教学科研重担的各位先生则正沿着前辈大师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争取更加发扬光大的灿烂业绩。姜亮夫先生、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他们三人学识之深湛，著述之广博，作风之精严，眼界之开阔都是令人由衷敬服的，他们都为社会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学术精品，也培养了许多继承其优良作风的杰出人才。对于人文学院及其所属的汉语史研究中心和古籍研究所来说，目前的状况可以用两句成语来形容，一句是薪尽火传，三位先生虽然去世了，他们的人品、思想和学术事业都有人继承和发扬光大，一句是桃李芬芳，三位先生的弟子们都成长起来，成了光大师门的教学和科研骨干。只要看看人员名单，看看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八个字应当说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浙江大学方面把《郭在贻文集》的出版任务交给了中华书局，这是对中华书局的信任和重视，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还愿的机会。我很遗憾没有和郭在

贻先生见过面，但是我早就读了郭先生的绝大部分论著，翻一翻四卷本文集，除了往来信函以外，郭先生大部分论著和文章，我都是在发表时读的。阅读当时有两个感受十分鲜明，一是在训诂学和俗语词的研究方面，他抉隐发微，多所发明，而且论证翔实，确凿无疑，一般都列有丰富的书证，言不虚发，发则中的，绝不凭孤证臆测立说。郭在贻先生的文章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纠正我许多望文生义或不求甚解的误解和疏失。研究训诂和语言的文章写得如此翔实生动，让非专业人员看了觉得非常受益，这是很不容易的。二是其学术论著的质量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厚积薄发，游刃有余。这次看四卷本文集更验证了这一点。郭在贻先生是在潜心研读多年之后，在广泛涉猎经史子集，戏剧传奇及笔记小说资料，在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各方面都做了丰厚扎实的准备之后才开始发表文章的。因为准备得厚实，所以一发而不可收，作品集中而精彩。其考释引证之精详，看似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得来全不费工夫，孰不知是顶着多大的外界压力，耗费了多少日日夜夜的苦读强记，才能做到博学通识，腹笥广大。他发表的文章多精品，多创获，而且精益求精，不断修订，足以传世。郭在贻先生真正是一个清贫刻苦、真诚豪爽、以学术研究为生命动力的真正的学者。1989年初当听到他英年早逝的噩耗时，我们无不为之震动和叹息。他是我们同时代人的楷模，是我神交多年的良师益友。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当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我的同学沈锡麟同志当时撰写了一副挽联：“晤面无缘论知己，三生恨事；刻书有愿证同怀，一瓣心香。”说出了我们的共同的心声。为这样人品高尚、学识精深的学者出书，出版他们经过时间考验的具有文化累积价值的学术精品，这是中华书局的光荣和骄傲。我们中华书局重点项目部的李解民、李晨光同志和浙江大学张涌泉、方一新、王云路等同志密切配合，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会议前夕赶印出了这部书，这是令人欣慰的。纪念三位先生就要以他们为榜样，锤炼自己的人品，发扬优良的传统，去浅薄，忌浮躁，戒急功近利，禁沽名钓誉，实事求是，刻苦自励，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或编辑出版的伟大事业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 22 日下午还在南京大学开会，参加《全清词·顺康卷》的首发式暨清词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华书局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全清词》编撰研究室自 1982 年开始合作的一

个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顺康卷》全卷精装 20 巨册，390 多印张，800 多万字，共收录 2105 位作者的词作 53437 首。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书，文科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华书局局庆 90 周年的重点书。22 日下午开完会，23 日上午就坐上了南京开往杭州的火车赶到这里，临时受命代表书局发言，下午 3 时左右到金溪山庄，匆匆忙忙写个发言稿，难免有仓促欠周之处。不过我还要借此机会讲一讲，作为中国出版界资格最老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创办至今也已经 90 周年了。无论过去和现在，中华书局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原杭州大学）有着长期的友好的多方面合作，不仅出版过前辈大师的学术论著，也出版过后起之秀的新锐作品。古籍整理和相关学术著作的出版一直是中华书局安身立命的主业。我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专业特色和品牌优势，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只能巩固和加强。我们作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事机构的地位不会改变。我们真诚地希望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包括汉语史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等部门继续保持和加强友好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不是排他性的，我们也和其他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多方面合作，在研究、出版、交流、切磋的进程中，建立一种互信互助、优势互补、荣辱与共的建设性关系。我希望：我们计划合作的项目，例如《敦煌文献合集》、《孙诒让全集》、《仪礼正义》和《水经注》等重大合作项目，都能高质量地顺利完成。无论何时何地，出版社的发展都离不开高等院校、研究机关和广大作者的热情支持。谢谢大家！

八、赵振铎教授的发言

事前没有准备，因为我来是想着向大家学习，交了一篇不成器的论文，反正也是想听大家的意见。昨天到了，下午友人又找我出去。临时受命要我发言，想了一下到底该说什么。因为我还是算训诂学这个圈子里的人，对这三位先生还有很多敬意。

我记得 2000 年我到杭大出差，到汉语史研究中心，就看见三位的照片挂在研究室里，当时我就非常感慨，我们来评估汉语史基地，三位先生在汉语史方面所做的工作今天看到了很好的结果，就是评上了汉语史的研究基地。这三位先生我都见过，而且都请教过，有些先生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

我记得我在读中学时，大概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语文教师就是写《广释词》

的徐仁甫先生，他跟姜先生在高师时是很要好的同学。徐先生当年在成都办了个杂志，叫做《致学》。当时我们问到姜先生，徐先生说：“他是我的同学。”后来我还在《致学》杂志上看到姜先生的好些文章。真正见到姜先生是在解放后，可以说是文革以后。1981年《汉语大词典》在杭州开一个编委会，我当时在四川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作为《汉语大词典》邀请的兄弟字典的代表来到杭州。当时来杭州时，字典办公室给我们一个任务，邀请姜先生作为《汉语大字典》的顾问。我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开会。有一天，在会议中我到姜先生的寓所里，我和武汉大学李格非教授一起去的，恭请姜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去后自报家门，我说我是四川的，叫赵振铎。姜先生说：“我知道。你祖父当时在高师教书。我那时候没有听到他的课，但是我知道。”然后和我拉家常谈当年他在高师从龚道根先生学习的情况。龚道根是很有名的学者，逝世比较早，抗战时害感冒去世的。姜先生谈了很多龚先生的事，问他后人怎么样了，我说他后人都从政，是什么省的省委委员。姜先生说，其实龚先生那些书那些学问要有人继承。还谈了很多，姜师母陶秋英说了：姜先生和人谈话只有 5 分钟，姜先生身体不好，你们是不是以后再谈。姜先生马上说：赵先生不是外人，成都来的，这要多说几句。我们谈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姜先生也欣然答应做《汉语大字典》的顾问。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我们经常出差到杭州，到杭州就一定要去看姜先生，向他请教。我最后一次见到姜先生是到杭大查书，得到姜先生大力支持，他和图书馆游先生说四川来的人要查书，你给他们方便。我把杭大图书馆有关我需要的书都查了，而且做了详细的笔记。以后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出差，都在学校里，就再也没有见到姜先生了。

见到礼鸿先生是在 1977 年，在青岛开《大字典》的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蒋礼鸿先生。但在这以前，我却知道他。《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二版出来后我买到了一本。当时不知道蒋先生在什么地方住，怎么样。当时祖父还在，文革之前，我就问祖父：这位先生写这书写得很好，这个人是哪位啊，他在什么地方啊？我祖父就去翻他的书。他写日记，每天都写日记。他翻到 1942 年在中央大学教书的一篇日记，写道：有位姓蒋的和姓盛的两位先生到他家去，他还留他们吃了饭。他在日记上都写上了。他跟我说：这两位先生都见过，都是很有学问的年轻人，现在他们出这个书很好，让我好好

读。所以我就知道这两位先生的一些情况。后来到了 1977 年，在青岛开会，本仁教授跟我介绍蒋先生，这才认识了。蒋先生听说我在编字典，问我一些怪字看到过没有，我说的确没有看到过：一个“门”只有半边，我赶紧抄下来带回去。从那以后，也经常到杭州来开会，那些年训诂学活动也比较多。也经常去看蒋先生，听蒋先生讲一些问题，讲了很多关于学问方面的问题，的确对我很有教益。虽然我不是蒋先生的学生，但我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里研究汉语史提到以纵和横两个方面而作比较研究受到很大教益。

与在贻先生接触是在文革之后，以前没有这个机会。来杭州开会，住在南山路的大华饭店里，在贻先生有一天到我屋来找我。我说我读过他的文章，但没有见过面。我开始以为在贻先生跟我年纪差不多，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比他大十几岁。以后就有了训诂学会，训诂学活动时，经常在一起，我们经常在同一个屋。我发现在贻先生读书非常用功，他在书上还批了很多。我说：“我这个懒人书上看不见写什么东西，最多画个问号，我不懂。你的书写得很多，我要向你好好学习。”1983 年，我们在杭州一起讨论，当时，要写个训诂学讲义。那时是教育部给的一个任务，许嘉璐给的一个任务。有在贻，有我还有几位先生——唐文。他提到训诂里要加一章“俗语词的研究”，当时他谈了很多道理，谈得很好，所以我们《训诂学》多了一章：俗语词研究。后来这本书不知什么原因不出了。不过在贻先生提出俗语词研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跟在贻先生接触比较多，他的文章也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很多问题谈得很有创见。后来每一两年我们都见一两次面。郭在贻去世，我也在家生病，听到的确很难受。开这个会，这几位先生的道德文章给我教益非常大，不是客套话，他们对我的治学有很大启示，令我最感动也最值得学习。这三位先生他们不仅是自己的道德文章，还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而且，浙大汉语史研究基地办得相当成功，我们纪念三位先生要很好地发扬光大，院和系给这个专业大力的支持，刚才许副委员长谈了，前次我来评估也谈了。现在的学校往往是重理轻文，文里又重文轻语，语言学在很不重要的地位。我们有历史教训，四川大学汉语史原来也还可以，现在感到有点不景气，与自身有关系，我们工作做得不好。

另外，学校给我们的关心也不够，既然浙大有这么好的基地，还有这么一批中青年教授，还有年轻的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流动站成员。我看了，校院给更多的支持，肯定能够将三位先生的学术、他们的治学发扬光大。耽误大家的时间，很对不起，谢谢。

九、佐藤晴彦教授的发言

首先非常感谢浙江大学邀请我参加这次会，并给我在此发言的殊荣，使我有机会表达我对两位我所尊敬的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的学者，蒋礼鸿先生和郭在贻先生的怀念。我第一次见到郭在贻教授是在一九八六年我赴沪参加第二届近代汉语研讨会的时候。当时他以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质量的论文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那时年轻的他就已经是一位引人注目、中外闻名的学者了。我在会上见到郭在贻先生的时候，他由于刚刚因胆结石开过刀，所以脸色显得稍微有些苍白，但他那睿智的眼光却让我深深地感到了他独特的傲然临风的学者风范。

在会上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而且由于著名的敦煌学家蒋礼鸿先生当时也在杭大任教，因此我和那时一起来华参加会议的奈良女子大学的松尾良树先生向郭在贻先生提出我们希望去杭州大学参观并同时拜见一下蒋礼鸿先生的要求。郭先生欣然答应。就这样我们第一次来到了杭大。杭大的师生热烈欢迎了我们，蒋礼鸿先生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所有这些都使我们非常感动。光阴荏苒，转眼间，已经十六年过去了。没想到，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却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两位学者的怀念，而再不能面对面地同他们交流切磋了。

提起蒋礼鸿先生，我们自然就会想起《义府续貂》、《商君书锥指》和《怀任斋文集》等他的这些训诂学著作。但是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一大作。该书的第一版出版于一九五九年，当时仅仅只有 88 页的小册子，经过 60 年、62 年、81 年和 88 年等前后四五次的修订工作，最后竟成为 600 多页的大作。在这期间，蒋礼鸿先生孜孜不倦地对这本书进行修订，每次修订篇幅都大大增加，蒋礼鸿先生所下的工夫之大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有人这样说过：“《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成长正是反映着中国敦煌学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发展途径。”这本书对敦煌学所作的贡献之大跟张

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在古典文学上所作出的贡献一样，不是在此只言片语所能表达的。由于蒋礼鸿先生没有能看到原卷的照片，只是根据《敦煌变文集》进行工作的，因此也有像郭在贻先生说的那样蒋先生“是上了铅印本的当”这样的地方（见《俗字研究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校读》），但是，凡是要想研究敦煌变文和其它敦煌资料的学者，过去、现在自不用说，就算将来，如果没有蒋礼鸿先生的这本书，也仍然是“寸步难行”的。

郭在贻先生以《训诂丛稿》、《训诂学》、《敦煌变文集校议》和《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而成为十分著名的学者，这些著作对各个领域所作的贡献都非常大。每本著作里都贯穿着郭在贻先生这样的思想。他说：“与其出十本粗制滥造、雷同抄袭的书，不如出一本精雕细刻、有独到之见的书。”（见《回顾我的读书生活》）实际上他在自己的每本著作中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实在令人敬佩。对我来说，他的著作中印象最深的一本就是《训诂学》。

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郭先生对训诂学的热爱，可以看到他要建立一个新的训诂学的热情，也可以看到后来训诂学发展的前景。据我了解，是他第一次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要把南北朝以后的那些俗语词，例如敦煌变文和王梵志诗等俗语词的训诂也纳到训诂学的轨道上去的主张。我认为在训诂学这样一个传统性非常强的学术领域里提出这么富有新意的见解是非要对自己的学问有充分的信心和巨大的勇气不可的。郭在贻先生就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觉得他很令人敬佩。郭在贻先生治学很严谨，尤其严格要求自己。他的这种精神表现在他的这句话里：“假如拙作只是因循旧说，略无创新，那就应该拉杂摧烧之，何必加以出版，既消耗纸张，又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呢？”（见《训诂学》“后记”）

和郭先生会晤以后，我和他通过几次信，他每次写信都用毛笔（据说他当时也每天练一个小时的书法），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而且信都是用很有风格的文言写来，而写回信的我呢：笔是圆珠笔；字呢，是乱七八糟；而文体呢，则是完完全全的白话，无论我怎么模仿他那样有风格的文章也是枉然。每次接到他的信我都很高兴，可是当要写回信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很烦恼，只好硬着头皮应付一通。可是万万没想到，一

九八九年他却突然那么早地离开了我们。

一九九七年《敦煌变文校注》这本将近一千三百页的巨册终于出版了。当我看到《敦煌变文校注》“前言”如下这一段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一九八九年一月，正在‘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大体完成，并将转入《校注》的撰写之际，万恶的癌细胞竟突然夺去了郭师年轻的生命！郭师在留给我们的遗书中说：“涌泉、黄征：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

看了这段话，想到当时的郭在贻先生要做而没有做到的研究工作和要写而没能写的学术著作，想到他尚有许多壮志未酬而含恨去世的心情，我怎么也不能抑制住自己悲痛的心情，竟失声痛哭了出来。“苍天无情收英骨，英雄遗恨在人间”，就是现在每次想到郭在贻先生的那份遗书，我也会黯然泪下。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张涌泉先生和黄征先生继承郭在贻先生的遗志，在郭在贻先生去世之后，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敦煌学的书；方一新、王云路先生继承了郭先生在中古汉语的成就并将其发扬光大。可以说在蒋礼鸿先生开垦的土地上，郭在贻先生播下的种子，正在开出一朵朵夺目的鲜花，结出一串串累累的硕果。我相信今后浙江大学的训诂学将会迎来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世界。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贺信选登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发来的贺信

欣闻贵校于 2002 年 5 月举行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教授的纪念活动，我委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预祝纪念活动圆满成功。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位先生在敦煌学、楚辞学、汉语史、经学、古籍整理等领域有深厚的造诣，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国内外学界有很高的声望。如今，他们的后学、弟子们仍在黾勉从事着这些研究工作，并赢得了学界高度认同和广泛关注。

浙江大学隆重纪念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三位先生，缅怀先辈，激励后学，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深远的。值此学林盛会之际，谨向浙江大学古籍所并通过你们向大会表示祝贺。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沈家煊 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侯精一的贺信

欣闻“纪念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召开，我们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中国语言学会，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愿会议圆满成功。

江浙水乡，钟灵毓秀，在近代文化学术领域，更以国学发达，大师云集，文明遐迹。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的昌盛局面是同他们的远见卓识、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前辈学者开创的事业，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做出新贡献。

学术交流

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来我中心讲学

2002 年 5 月 20 日上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东方文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访问了本中心，并为师生作了题为《谢灵运别论》的学术报告。王教授在肯定了谢灵运山水诗成就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谢灵运在语言学上的贡献，指出要全面去看待谢灵运这个人。王邦维教授系统考察了佛经翻译方面以及史籍中有关谢灵运的记载，总结出谢灵运在语言学成就的几个方面：尝习梵语；对不同性质语言的区别、不同语言的不同文字、方块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以及语音发音原理都有自觉性的认识；《十四音训叙》在四声的起源、十四音的源流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王邦维教授的这种不拘泥于前人成说、善于从新的角度去发现问题的研究方法使大家很受启发。

香港科技大学丁邦新教授来我中心讲学

5 月 22 日上午，著名语言学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了题为《中国语言与文学相关的几个问题》的讲座。丁先生首先从汉语

的特点出发，对中国文学的几种特殊形式作了阐释。其次，作为音韵学（被称为汉语史研究中的“绝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丁先生从音韵学的角度出发，深入浅出的阐述自己对平仄和长短、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起源等问题的见解，同时认为“元曲韵字示意说”缺乏根据。最后，丁先生又对文学和语言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渗透作了说明。丁先生独到的学术视角、风趣的讲演博得师生们热烈的掌声。在精彩的讲座之后，丁先生对师生的问题作了解答。

香港科技大学张洪年博士来我中心讲学

5月22日上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张洪年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了题为《粤语一百八十年》的讲座。由于汉语言文分离的传统，许多方言的语言特征在中土文献当中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研究方言演变材料一直比较缺乏。张先生利用从1828年起欧美人编著的一系列学习汉语的书籍，在对其进行鉴别和缜密分析的基础上，对粤语一百八十年中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了举例阐释。张先生利用材料的角度、严谨的学风，给在座师生很大启发。

香港科技大学朱晓农博士来我中心讲学

5月22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朱晓农博士为我中心师生作了题为《音韵学的新途径——实验语音学和社会语言学能对音韵学起什么作用》的报告。朱先生指出：中国音韵学的传统向来是研究历时的语音演变，但是，有一些音变是古今中外反复出现的。实验语音学和社会语言学可以对这种现象做出规律性的解释。朱先生首先从三个塞音 b、d、g 的发音原理出发，指出在这三个塞音在一种语言中的消失总是以 g 为开始，不但解释了浊塞音在语言中的共时分布情形，同时解释了汉语音韵学史上群母 g 的消失问题。其次，朱先生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指出存在着清音浊化这一与上述规律相反的方向。朱先生对实验语音学的介绍以及分析问题的角度，给师生们以很大启发。讲座结束之后，朱先生和师生进行了交流。

香港科技大学张敏博士来我中心讲学

5月22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张敏博士为我中心师生做了题为

《认知语义学、类型学和汉语词汇、语法史的研究》的报告。张先生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从认知语义学和语言类型学、语言普遍现象的角度研究实词词义演变和实词虚化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张先生介绍了许多有关的国际上最新语言理论，同时结合汉语、英语词汇和语法的实际进行了阐述，最后指出，这样的研究给古籍断代提供了可靠的理据。张先生的讲解对扩大师生的学术视野、开阔学术思维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方一新教授参加首届古代汉语教学研讨会

6月16至17日，第一届全国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我中心方一新教授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办，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所大学的代表，《古汉语研究》编辑部、高等教育出版社也派人参加了会议。全国性的古代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已经举办过多次，而专门研讨古代汉语教学问题的学术会议这还是第一次，具有开创意义。参加本次会议的都是国内各高校讲授古代汉语及相关课程的教师，大家利用短短的两天时间，探讨古代汉语课教学过程中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包括课程课时安排，教材编写，教学手段，课外阅读以及存在的问题等，交流经验，沟通信息，都感到确有收获。南开大学中文系洪波教授还在会上演示了他们开发的古代汉语课的多媒体教学课件。会议商定，下一届古代汉语教学研讨会将由陕西师范大学主办。

方一新教授参加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

6月28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等多家单位主办的“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我国语言学界最负盛名的权威刊物《中国语文》自1952年创刊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记载了中国语言学研究曲折向上的发展历程。会议邀请了国内外一百多位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既有德高望重、年届耄耋的张斌、廖序东先生等老一辈著名语言学家，也有目前活跃在各个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方一新教授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不听”之不允许义的产生年代及成因》的报告。

张涌泉教授访问湖南师范大学、贵州大学

应湖南师范大学、贵州大学有关部门的邀请，张涌泉教授于 2002 年 5 月、6 月间先后访问了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贵州大学中文系，主持上述两校的博士、硕士论文答辩，并与两校相关专业的老师就加强相互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商谈。张涌泉教授还为贵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作了关于敦煌文献价值的学术演讲。在贵大期间，贵大校长陈叔平教授还先后两次与张涌泉教授及贵大中文系的领导座谈，商讨两校相关学科的交流和合作问题。

张涌泉教授参加“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

由台湾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2002 年 6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复旦大学举行，共有来自海峡两岸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类书和丛书。本中心张涌泉教授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担任分组会议的主持人，他在会上作了题为《类书引文异同释例》的学术报告。

获奖信息

张涌泉教授获“高校青年教师奖”

教育部第三届“高校青年教师奖”5 月初揭晓，本中心张涌泉教授获得这一殊荣。

“高校青年教师奖”是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定的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是“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的重要项目”。其宗旨是立足国内高校培养造就优秀拔尖人才和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教育部在发文中指出，荣获“高校青年教师奖”的教师是我国高校青年教师中的优秀代表。他们承担着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科技创新的重任，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希望全国高校广大青年教师向这些获奖教师学习，开拓创新、永攀高峰。

人才培养

本中心多名本科生研究生获中国古文献奖学金

由国家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设立的“中国古文献奖学金”第七届评奖工作已于日前揭晓。我校中文系古典文献班（本科）共有 3 名学生获此奖项，同时我中心有 4 名研究生获此殊荣，他们是：何华珍（2000 级博士，导师为张涌泉），张诒三（99 级博士，导师为方一新），朱大星（99 级硕士，导师为许建平），叶菲（99 级硕士，导师为任平）。

汉语史研究中心于 5 月 29 日晚举行了颁奖仪式，校教务部副部长颜洽茂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邵培仁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吴秀明教授参加了颁奖仪式，并和中心师生一起探讨了古典文献专业的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

本中心博士生通过论文答辩

5 月 26 日，我中心两名博士生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1999 年 9 月份入学的博士生王绍峰和张诒三，经过三年的勤奋学习，于今年 4 月提交了学位论文。打印寄出后，于 5 月中旬陆续收到论文评阅书，评阅专家们对两位博士生的论文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可以进行论文答辩。

5 月 26 日上午，我中心邀请了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南京大学汪维辉教授、湖南师大蒋冀骋教授、杭州师院汪少华教授和本校祝鸿熹教授等 5 位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专家们认为王绍峰、张诒三的论文选题具有开创意义，文章材料详实，结论准确，反映了比较扎实的功底和严谨的学风。两位博士生对专家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最后都以全票通过论文答辩。

王绍峰和张诒三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训诂学，指导教师是方一新教授。

王绍峰的学位论文是《初唐佛典词汇研究》，论文选取未被学界充分重视的初唐佛

典作为考察对象，采取点面结合方法，描写了其中的词汇现象，揭示了它在汉语词汇史上的地位，尝试把词语的训释和词汇史研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在详实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一些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就像语音、语法的历时变化一样，类推、语素替换是词汇演进的基本规律。

张诒三的学位论文《隋以前若干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变化研究》，以汉语词语之间的搭配随着时代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特征的语言事实为立足点，以词语搭配变化反映词语组合关系和词语意义变化的理论为指导，通过调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代表性的传世文献，运用描写和比较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饮食类和行走交通类动词与名词的搭配在唐以前的历时变化。作者认为：词语搭配的历时变化研究是考察一个词的义域、义位、语法功能等方面变化的必要手段，对于辨释同义词、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感谢赠书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向本中心赠送其译作《中国化的文法》一书，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佐藤进先生向本中心赠送了其著作《中国的方言和地域文化》、《宋刊方言四种影印集成》，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佐藤晴彦教授向中心赠送了《古本老乞大》，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